

苏东坡



全集

苏东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文豪，一个卓越的书画艺术家，一个学识渊博的学术家，一个医学家，一个农田水利专家，一个懂得气功、烹饪的养生专家。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，的确称得上是旷世无双的全能文士。

第一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苏东坡全集

第一册

本册主编：

段书伟 杨嘉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东坡全集/ (宋) 苏东坡著; 毛德富等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7. 5 (2009 年 1 月重印)

ISBN 978-7-5402-0780-9

I. 苏... II. ①苏... ②毛... III. 苏东坡-全集
IV. I214.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3759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380.25 印张 5000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780.00 元 (全十册)

《苏东坡全集》编委会

主 编：段书伟 李之亮 毛德富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晓东 杨嘉仁 赵宗乙
胡和平 姜建设 贾 滨
暴拯群

参与撰稿人员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马 春	王治锋	师长生
安国楼	刘中朝	许华伟
李 琳	李贤民	肖 燕
陈 曦	尚达翔	周春玲
赵鹏朴	贾 莉	聂文萌
徐 飞	高金生	

前 言

《苏东坡全集》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所著诗、词、各种散文等作品的全编。作为继李白、杜甫之后成就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，作为一位充满魅力，旷达、幽默、情感丰富的睿智之士，苏东坡的名字家喻户晓。由他那横溢才华结晶而成的作品集，毫无疑问，是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一块璀灿的瑰宝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四川眉山人，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，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。他一生历经了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个朝代，这正是北宋表面太平繁荣，实际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，社会危机暗中滋长，并急剧发展的时代，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，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。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苏轼，始终关怀着社会政治，希望北宋王朝能够强盛兴旺，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能象前辈贤人范仲淹、欧阳修一样有所作为。对社会政治的关心，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朝廷内的党争，他的人生，也就踏上了坎坷不平的道路。

从少年时代起，出身于富有文化修养家庭的苏轼，就立志刻苦读书，将来报效国家。前辈的熏陶，良好的家庭教育，自己的

发愤努力，使他青年时期便具有了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，他熟读儒家经典，出入诸子百家，谙熟历史掌故，长于纵横议论，文笔气势磅礴。他 21 岁那年随父进京参加科举考试，一篇《刑赏忠厚论》倾倒考官，轰动京师。当时任主考官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为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为，出于避嫌，把作者屈居第二，以后得知出于苏轼之后，对苏轼的文才大加赞赏，说：“读苏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。”（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）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（《诚斋诗话》）

中了进士，步入仕途的苏轼，希望能对露出危机的北宋王朝作出积极贡献。仁宗末年，他向朝廷上制策，提出厉法禁、抑侥幸、决壅蔽、教战守等主张，请求朝廷“果断而力行”，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。但苏轼的改革思想，倾向于“任贤”，倾向于改善施政方法，反对急进的变革法制。当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变法，统治阶级内部因而形成新党、旧党之争时，苏轼也便卷入旧党，受到新党的排挤，并因此而离开京师。九年中，先后出任杭州通判，转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。苏轼在地方官任上，坚持行惠民之政，对新法推行中的某些弊端，苏轼常常“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安。”（《宋史·本传》）在徐州任上，黄河决口，洪水围城，苏轼亲率城内军民抗洪抢险，冒雨筑堤，与洪水奋战三个多月，终于保全了徐州城。由于政绩斐然，受到朝廷降诏奖谕。元丰二年，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，被捕下狱。某些心怀叵测的权势人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千方百计罗织罪名，苏轼命在旦夕。亲友奔走救助，连太后临死也为他讲话，宋神宗终于下诏宽赦了他，贬谪黄州安置。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的苏轼，没有消沉，反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，谪居黄州期间，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词文赋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。

哲宗即位，高太后临朝，旧党执政。苏轼被召还朝，升任翰

林学士，为朝廷起草文诏，常随皇帝左右。这时，旧党执政者要废除一切新法，对社会积弊有深刻洞察的苏轼，知道新法的某些措施对裁抑贵族特权，增强国防力量有利，因此反对旧党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，主张对新法“较量利害，参用所长”。这样，便遭到旧党一部分人的攻击，尤其是他的高才，他那不随俗的性格，更使朝廷内心术不正之人不能容忍，接二连三罗织罪名对他弹劾。为了避开政治漩涡，苏轼不得不再次被迫离开京师，出知杭州，后又转知颍州、扬州、定州。所到任上，他为当地百姓办了一连串好事：在杭州，为受水旱灾害的杭州百姓数次上书朝廷，请求减免赋税，开仓赈济饥民。他亲自勘察地形，在西湖修筑长堤，疏浚水道，兴修水利。既灌溉了农田，减轻水患，又美化了西湖风景。所筑长堤，世称“苏堤”，为西湖美景之一。杭州百姓非常敬爱他，以至“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，又作生祠以报。”（《宋史·本传》）在颍州，他上表朝廷，请留黄河民夫修境内沟洫，以解当地水旱之患。在扬州，数次为民请命，请求诏免百姓多年“积欠”，减轻人民负担。在定州，他修饬军备，加强边防；为民上表请求减价柴米赈灾。虽然在颍、扬、定三地任职均不足半年，却力行善政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。1093年9月，高太后逝世，哲宗亲政，重新起用新党，对元祐时期执政的旧党人士一律指斥为“元祐党人”，株连下罪，苏轼也因而遭祸，被贬谪到“蛮荒”的岭南惠州，以后，再贬“风涛瘴疠”的海南。此时，他已年届六旬，面对残酷的政治迫害，险恶的生存环境，他乐观的生活态度不变，在惠州和海南的六年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。这一时期，是他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期。

1100年，哲宗驾崩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本以为此生必死海外无疑的苏轼，终于得到回返内地的机会，但是，他已是65岁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回返内地的长途跋涉，使他染上了疾病，终于在第二年，病逝于常州。噩耗传来，“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，

其君子相与吊于家。讷闻四方，无贤愚皆咨嗟出涕。”（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）

苏轼受到人民深深的爱戴，除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外，首先是他对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。他一生勤于创作，在他66年的生涯中，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，300多首词，各种文章约4500篇。他的诗、词、散文里所表现出的豪迈气象和优美情致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在当时倾倒世人，被奉为天下文宗，死后彪炳后世，“雄视百代”。（《宋史·本传》）

下面，我们对他的诗、词、散文分别作一概略评介。

苏轼的诗，富于创造和开拓，他取材广阔，创意雄奇，长于描摹，善于比喻，用事用典，挥洒自如，议论风发，理趣横生，这些特点，使苏诗成为有别于唐诗的宋诗体制的完成者的突出代表，对宋诗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苏轼诗歌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他对诗的意境的开拓。苏诗取材广阔，生活中的事物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，而且平凡的事物一旦被摄入诗中，往往意境翻新出奇，如《守岁》的发端：

欲知垂尽岁，有似赴壑蛇，修鳞半已没，去意谁能遮。

一年将尽，时光不可挽回，这本是人们常言之理，但到了苏轼笔下，忽出新意，运用奇妙的比喻，把岁尾比作入壑的蛇尾，瞬即溜去，不可阻留！诗的奇妙意境让人称绝。再如《有美堂暴雨》：

游人脚底一声雷，满座顽云拨不开，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

把暴雨写成是由于大海被大风吹得倒了过来。平凡的事物，经苏轼大胆想象，创造出不凡的意境。

《游金山寺》一诗，从江潮的涨落，江水的奔流不回，想到江之源的故乡，想到自己如江水不回的宦游不归。到了诗的后半段，忽发奇想，把江心炬火假托为江神见怪：

江心似有炬火明，飞焰照山栖鸟惊，怅然归卧心莫识，非鬼非人竟何物，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见怪惊我顽。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。

意境的光怪陆离，奇崛神幻，直逼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。

至于他那脍炙人口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（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）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（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）把人生比喻为雪泥鸿爪，西湖比为西子所创造出的意象，更是深入人心，化作成语，化作习俗语，具有了永恒生命力。

从上举诗歌中我们还可看到，这些美妙意境的创造，无不有赖于新鲜、贴切的比喻。因此，钱钟书先生说，苏诗“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、新鲜和贴切，而且在他的诗里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‘博喻’，或者西洋人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：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。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旧小说里讲的‘车轮战法’，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，本相毕现，降伏在诗人笔下。”（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）钱先生还特别举出苏轼《百步洪》一诗描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文字来加以证明：

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过隙珠翻荷。

四句一气贯注地用了七种形象来作比喻，把水势的迅急，形容得“本相毕现”，使读者如身临其境，读来惊心动魄。

再看他在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中对荔枝的描写：

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姝。……似开江鳊斫玉柱，更洗河豚烹腹腩。……”

前四句连用数个比喻，把荔枝的果壳、内膜、果肉拟人化，活生生勾勒出一位高洁的仙女，苏子对荔枝这般倾情和赞美，令

读者也禁不住地一往倾心。

即使诗中描写人物形象，也往往借比喻来传神。如《送李公恕赴阙》，写友人李公恕：

君才有如切玉刀，见之凛凛生寒毛，愿随壮士斩蛟蜃，不愿腰间缠锦绦。

李公恕为人的刚健豪爽，经过这般警奇、新颖的比喻，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

苏轼诗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大量用事用典，议论风生、充满理趣。这也是宋诗有别唐诗的突出特征。在苏轼之前，宋诗的议论性、哲理性特征已渐趋形成，到了苏轼手里，由于他饱读诗书，博通百家，才思敏捷，艺术腕力高强，对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典故、史实，驾取得纯熟轻巧，所发议论，富于哲理，而作为文坛领袖，对宋代诗风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，因此，具有以上特征的苏诗，也就成为宋诗的突出代表。

苏诗对典故的运用，大多精当贴切，使诗句得到点化，意味深长，有些则诙谐幽默，妙趣横生。试看他滴居黄州时所作《太守徐君猷，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，以诗戏之》：

孟嘉嗜酒桓温笑，徐邈狂言孟德疑，“君独未知其趣耳！”
“臣今时复一中之！”风流自有高人识，通介宁随薄俗移，二子
有灵应抚掌，“吾孙还有独醒时！”

这本是一首和朋友开玩笑的戏作，没有什么实际内容，但全诗格调十分洒脱，诗中用了两位好酒的古人的典故，用他们的言谈和事迹，巧妙地将现实中二位不饮酒的同姓友人联系在一起。诗中一、三、五句用孟嘉典，二、四、六句用徐邈典，七、八两句则将以上六句四个典故并拢，再用一个典故，牵合徐、孟二友人。该诗章法奇特，用事用典亲切自然，语言诙谐幽默，读来令人绝倒。

再来看他是如何在诗中阐发哲理的，我们取那首著名的《题

西林寺壁》为例：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
缘身在此山中。

诗从山的形象入手，但却不靠形象取胜，而是以具有哲理的诗思启迪人，由于哲理的发人深省，形象愈发显得耐人寻味。其实，所有的山都有远近高低和横看侧观的差别，但由于苏轼从中悟出了深刻的哲理，于是庐山就有了形象魅力，这样，哲理的体悟与形象的描绘便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。似乎哲理的思考远较形象的描绘更显重要，但哲理的体悟与形象的描绘又是如此和谐，所以这首诗也就成为古今哲理诗中的极品。

勿庸讳言，苏诗的用典和议论化、哲理化也有其弊端。诗终究是要以形象来创造意境、抒情言志的。如果大量堆砌典故，一味发议论，谈哲理，势必削弱诗歌的艺术性。苏诗中一些篇章好用冷僻典故，议论连篇，许多诗论家都对此提出过批评。

与其对诗歌和散文的贡献相比，苏轼对词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贡献更大。词自唐代产生之后，发展到五代，基本形成了描写艳情别绪，文辞绮靡婉丽的格调。尽管北宋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柳永等人从词的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开拓，但词从思想题材到遣词、造意都依旧限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。当苏轼以词坛巨擘的形象出现之后，词终于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彻底解放。从登上词坛，苏轼便以清旷雄豪的歌吟冲破了旧词坛被艳情别绪笼罩的藩篱，在词坛上开创出豪放雄健的一派。他把词的题材从男女恋情、离愁别绪扩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无论怀古感旧、记游写景、抒情言志、谈禅说理，举凡入诗的材料他都可以入词，词的意境也因此得以提高。原来依附于乐曲的歌词，从此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。

在词中，他可以抒发“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（《沁园春·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》）的豪情壮志，也可以表现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（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）的狂放不羁。可以发出“人生如梦”的喟叹，也可以展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（《定风波·黄州沙湖道中遇雨》）的豁达。看到“江山如画”，他禁不住去描写那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）的壮观景色；见到中秋明月，他放怀吟诵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（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）的纯洁情怀。梦中见到亡妻，他描绘“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（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）的缠绵凄情，寄托对亡妻的无限哀思和怀念；行将告别黄州，他追忆“山中友，鸡豚社酒，相劝老东坡”（《满庭芳·归去来兮》）的真挚友情。走到农田村舍，他热情地“问言豆叶几时黄？”“谁家煮茧一村香？”（《浣溪沙·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》）面对清茶野蔬，他喜悦地咏写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”（《浣溪沙·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》）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，情感世界的林林总总，都被他写入词中，放声吟唱！

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的，而以豪放雄健为其主要特点。前人评其清雄豪健之作“读之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”（胡寅《向子湜酒边词序》）令人感到“复乎遗尘绝迹”“无以步骤”（王鹏运《半塘手稿》）此类词脍炙人口之篇特别多，如前面提到的《沁园春，赴密州早行马上怀子由》：“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”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”笔力之雄健，豪情之奔涌，跃然纸上。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在描绘了“千骑卷平冈”出猎的雄壮场面后，又高歌长啸：“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，又何妨，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《水调歌头，明月几时有》的把酒问天，对月击节；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凭吊英杰，大江浩歌。这些词作无不激情如潮，热情如火，充满浩然之气。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审美享受。

豪放雄健作品之外，苏轼也写了许多描绘山川景色的清新、明丽之作。试看《行香子·过七里滩》的上片如何描写七里滩的

秀美景色：

一叶舟轻，双桨鸿惊，水天清，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，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

当他把自己旷达的襟抱与秀丽的景色相交融时，便创造出一种蕴藉空灵的意境。如《西江月·照野潏潏浅浪》中所描绘的原野空旷、月色清幽、溪水冷冷、小桥翼然的景色，与他醉中恍若羽化、翩若登仙的感觉相融，真使人读来“疑非尘世”。此类词作还有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、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等，都给人一种超尘绝俗，发人遐思的特殊美感。

作为苏词风格的另一面，苏轼还写了相当数量情致深婉的婉约词。其中有写情人相思的如《祝英台近》，有写美人姿态的如《洞仙歌·冰肌玉骨》，也有花间尊前的赠妓之作。但其趣味却不庸俗，不艳媚，仍是“指出向上一路”（王灼《碧鸡漫志》）。尤其是那些咏花状物、写景寄情的佳作，如《水龙吟·似花还似非花》、《贺新郎·乳燕飞华屋》、《蝶恋花·花褪残红青杏小》等，更是高格远韵，压倒古今。在《水龙吟》中，他以拟人化的手法，咏写杨花，却又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分明在咏人：“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，莺呼起。”下片又从惜花入笔，写得感情浓郁，神意幽远。结尾又一转：“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，离人泪。”此词声韵谐婉，天趣独到，被誉为千古绝响。《贺新郎》中上半阙写美人，下半阙写榴花，却都含蓄蕴藉，意在形象之外，似有无穷意味，耐人咀嚼。《蝶恋花》“枝上柳棉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”二句，把惜春、伤春的情思，写得气韵不凡。

此外，苏轼还有不少描写田园风光、日常生活的小词，往往写得摇曳多姿、趣味盎然。这类词代表着苏词的另一种风格——自然亲切，清新淡远。如《浣溪沙》写兰溪雨景“山下兰芽浸短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潇潇暮雨子规啼。”词中的春雨、沙径、

小溪，松林、兰芽、鸟啼，诗情画意，隽秀宜人。再看《浣溪沙·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》：“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缲车，牛衣古柳卖黄瓜。酒困路长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，敲门试问野人家。”此组词共五首，描写初夏农村景象，这里仅录其四。读罢此组词，仿佛一股亲切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！

就是这样，苏轼在他的诗词中，时而放怀高歌，时而深情倾诉，有时轻松自然，有时旷达洒脱。他的诗词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既雄健豪放又多采多姿的风格，与他本人的思想、性格、学识、阅历、襟抱密切相关。苏轼的人生道路复杂曲折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顺境时，声高位显，逆境时，艰难困顿。不同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，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。苏轼一生无书不读，儒道佛典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。渊博的学识，促成了他复杂的思想，不同时期的人生遭遇，使他有不同的思想矛盾变化，反映在他的创作中，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：青年时的成功，使他声名鹊起，因而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，其时的作品，往往呈现出豪迈进取的峥嵘气象。在遭受沉重政治打击后的黄州时期，思想转向对人生的深刻思索和体味，此时的作品往往在雄健中又表现出高旷洒脱的气度。晚年岭南儋州时期，随着对人生的彻底体悟，其作品的风格更趋向平淡自然，而又“其实不是平淡，绚烂之极也。”（苏轼《与任论文书》）但无论在哪个人生阶段，始终都有清雄豪健之作，这说明，苏轼诗词多样化的风格中，豪放是其主脉。

最后，我们谈一下苏轼的散文。

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主要代表作家，苏轼的文章除了古文家们提倡的思想内容充实，语言自然畅晓，不尚雕琢的一般特点外，还具有文笔恣肆、气势磅礴，构思奇巧，姿态横生的独特艺术个性。

苏轼文章的磅礴气势来源于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学识，来源于他在创作上的长期刻苦锻炼，来源于他那勇于超越前人的张扬

的个性，因而他的文章如“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。”（苏轼《文说》）最能体现他文章气势的典型之作有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、《教战守策》、《表忠观碑》等，这些篇章，无一气贯注，如长江大河，浩浩荡荡。《教战守策》开篇即以生死忧患的警语夺人，接下来纵横议论，切中时弊。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以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的宏伟议论开篇，其后连用数组排比句，环环相扣，层层推进，议论痛快淋漓，气势排山倒海，文字冲越激扬。读来有如万钧雷霆，震聋发聩。苏轼的议论文往往博引史实，论辩滔滔，直抒胸臆，汪洋恣肆，颇有战国纵横家之风。在他的策论和历史论文中，这种文风表现得尤为突出。由于这部分文章与科场考试关系密切，所以他那严密的逻辑性和随机生发，翻空出奇的写作技巧就受到应举士子们的青睐，纷纷学习仿效，以致北宋中叶以来，苏轼的文章成为科场制艺范文，“文选烂，秀才半；苏文熟，秀才足。”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。”（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）这些当时的谚语，充分反映了苏轼文章当时的影响。

苏轼文章最优秀的部分是那些文学性较强的书札、小赋、序记杂记、杂说以及各类小品。这些文章虽然长短不一，但都具有语言平易流畅，情理交融，随笔挥洒，姿态横生的特点。他的前后《赤壁赋》绘景状物，如诗如画，抒情言理，高妙真切，结构跌宕回环，又如行云流水，语言清新自然，节奏疾徐有致，千百年来，倍受人们喜爱。二赋虽然题材相同，结构、立意却迥然有别，“前篇写实情实景，从‘乐’字领出‘歌’来”，后篇则“作幻境幻想，从‘乐’字领出‘叹’来，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，与前赋同一机轴，而无一笔相似。”（《古文观止》评注）《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》，主旨是追忆悼念亡友，而以师从文与可作画为文脉，从精深的画论起题，叙述跟从文与可学画经过，穿插与画竹相关的趣事，追忆与亡友的深厚友情，最后文笔陡转，方点出作

者曝书画见图忆亡友，痛哭失声的感人真情。文章结构奇巧缜密，行文迂回曲折，内容十分繁富：文中有论、有赋、有诗、有画、有书札、有谐语，而这一切又全被作者用来烘托与文与可的深情交往，为末尾的痛哭亡友作了不露痕迹的铺垫。《石钟山记》本是一篇记游文章，却以议论开篇，设问设疑，使游石钟山带有学术考证意味，其游记文的理念性突出，显然非同一般，文章的主题思想也得以开拓深化。文中描写景物，运用了夸张、比喻、形容、渲染、象声等多种写作技巧，使得全文声色并茂，叙述、描写、说理结合得自然和谐，被誉为“神来之笔”。其它如《凌虚台记》、《喜雨亭记》、《超然台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、《墨妙亭记》、《答李端叔书》、《范文正公集序》、《六一居士集序》、《太息送秦少章》、《日喻》等名篇佳作，无不巧于构思，善于立意，借题发挥，触处生春。即使一些体制短小的杂记、题跋，也写得情趣盎然，请看《记承天夜游》：

元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，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这篇一向被人称道的小文仅八十三字，苏轼却能用轻灵的笔触，寥寥几笔，摄魄传神地创造出一个鲜明、优美的艺术境界。还游刃有余地在结尾处置入一段人生感叹的文字，高超的艺术腕力由此可见一斑。同类的作品还有《记游松风亭》、《书上元夜游》、《记樊山》、《书临皋亭》、《梦南轩》、《记游白水岩》等，短者仅四五十字，长者不过一二百字，内容却十分丰富，有记叙、有描画、有议论，生动活泼，清新含蓄，逸趣横生。

作为一位高产作家，苏轼的创作雄健豪放的一面也偶有粗糙之作，善于传神的一面也有展开不够的遗憾，文笔恣肆的同时难免逞才使气之讥，优秀篇章之外也有无聊应酬之什，但毕竟瑕不

掩瑜，苏轼以其横溢的才华，卓越的创造力，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富赡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，苏轼作品中反映的宋代社会历史，所蕴含的美好情操和非凡智慧，所创造的优美艺术形象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，体悟生命，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道德情操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。但苏轼的作品典故多、旨意深、文字奥，向来被认为难读难解。为使苏轼的作品能面向今天的大众，我们冒着举鼎绝膑的危险，以自己浅薄的学力，对苏轼的作品作了编、注、译的整理工作。下面兹就整理的有关问题，给读者以说明：

一、苏轼的作品自宋代以来，流布甚广，影响甚大，历代注本、刻本繁多。但传本丛杂、异文繁复，编次不一，体例各异，阙漏严重，可以说，传世刊本，没有一种适于今天读者借以全面了解苏东坡本人及其作品的。为使今天的普通读者能全面了解苏轼及其作品，我们这次整理，特选用孔凡礼先生校点的《苏轼诗集》、《苏轼文集》，刘尚荣先生校证的《傅干注坡词》（含该书附录一《注坡词补佚》）作为我们的工作本。这三个本子，可以说是迄今收录苏轼作品较完备，校勘较精审的苏轼诗、词、文、赋的作品集。我们以工作本为基础，对所收作品重作编排，分别注、译。

二、本书对所收全部苏轼作品，分类并按写作年代序次编排。全书依次分为赋、诗、词、文、附录五大部分。诗以古体、律诗、绝句为序，词以词牌为类，文以文体相别。各小类中具体篇章基本以写作年代先后为序，年代不确定者置于同类编末。附录收录存疑作品及苏轼生平资料。

三、所收赋、诗、词全部加注。限于篇幅，注释力求简明。苏诗向称难解，连南宋大诗人陆游都感叹“东坡先生之诗，则援据宏博，指趣深远”，“游之所以不敢承命也。”（《注东坡先生诗序》）未曾轻易作注。所幸自宋迄今，代有学者攻研苏诗，使我们有所